

编者按:2018年以来,美国采取单方主义措施,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并不断升级。中美经贸关系的状况与演变不仅事关中美双方的利益分配,也深刻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的重构,甚至催生新的世界政治格局。深入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缘起,探求具有可行性的应对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本专题以各专家学者多角度、深层次的透视和解析,为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对提供了新的思考。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理论思考

张二震,戴翔

【摘要】与贸易保护主义通常发生在经济萧条时期不同,美国是在当前经济表现总体不错的情况下挑起对中国等多国的贸易摩擦的,其原因在于全球化利益分配的失衡。在以要素分工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方面,从静态利益角度看,虽然美国凭借技术等优势占据了价值链高端,获取了以增加值等为表现的大部分利益,但在促进产业和经济发展等动态利益方面发生了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变化,从而对美国主导的缺乏包容性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产生了冲击;另一方面,在要素分工条件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呈现出新形式,突出表现为传统的诸如劳资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利益分配失衡关系,进一步演变为“遗弃”和“被遗弃”的关系。在国内制度缺陷凸显、治理能力滞后的条件下,转嫁因内部利益分配失衡而激化的矛盾,归咎于外部因素,采取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政治选择。要走出“逆全球化”的困境,不仅要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同时还要各国进一步加快国内改革,为实现包容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 要素分工 人类命运共同体 包容开放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开放发展研究”(16JJD790025);江苏省“333工程”培养资金资助项目“全球价值链演进新趋势下江苏制造业转型升级举措研究”(BRA2017399);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经贸格局重构下的中国自贸区战略研究”(17WTA008)

【收稿日期】2018-12-20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9)02-0062-09

一、问题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顺利推进,由此带动了全球经济长达几十年的繁荣发展。在全球财富总量激增、民众生活得到大幅改善的同时,国与国之间也通过贸易和投资等纽带形成了更紧密的关系。可以说,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彼此相依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更加频繁和紧密。然而,这一进程却被2008年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所打破,突出表现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

逆全球化思潮的泛滥。尤其是自2017年以来,美国频频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表现出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行径和逆全球化倾向,挑起了与中国等多国的贸易摩擦并呈现出不断升级的态势。比如2018年9月美国政府悍然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进口关税,此后美国副总统对华发出了“将征收更多的关税,数字可能会大幅度增加一倍以上”的公然恫吓,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严峻挑战。应该说,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升级对华贸易摩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现有的代表性观点认为,美国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发生逆转,主导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打贸易战

以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二是通过打贸易战转嫁国内矛盾;三是期望以贸易战的方式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实现继续维护自身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的目标(戴翔等,2018;蔡昉,2018)。^①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美国会出现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化和调整,仍需要在理论层面上进行深度探讨。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当前的全球分工体系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占据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诸如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虽然也是本轮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明显处于中低端。因此从分工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分配格局看,相较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国等发达国家显然攫取了更多经济全球化红利。如果说排除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不论(实际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确实无法解释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的新变化,因为这种差异一直存在),而上述三个方面确实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缘由的话,那么其背后的逻辑是不是意味着当前经济全球化发生了某些根本性变化,或者说从某些特定层面上看,当代经济全球化是不是发生了更加有利于条件具备的发展中国家的新变化?这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探讨的大课题。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一直作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推动者的美国,为何会一反常态做出违背潮流和发展规律的逆全球化举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搅局者。

我们认为,贸易的基础是分工,看待贸易现象包括贸易摩擦不能就贸易而谈贸易,必须深入到国际分工层面。如此,才能对当代国际经济和中国经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鉴于此,本文力图从国际分工领域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变化出发,探讨当代经济全球化红利创造和分配机制的新特征,以期探寻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分析视角。

二、要素分工:经济全球化具有怎样的新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产品的价值链被分解了,不同生产环节和流程按照不同的要素密集度特征,被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

跨国公司以资本为纽带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实现了生产的国际化。与以往以“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相比,这种新的国际分工模式是以“要素”为界限,即一件最终产品的全部价值已不再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本土要素所独自创造,而是由多国以“优势要素”共同参与的结果。也就是说,各国是以要素优势而不是产品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的。从本质意义上看,这种现象可以称为“要素分工”(方勇,2013)^②。以“要素分工”为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经济全球化,与以往相比具有了新特征。这些新特征对国际贸易的基础、国际贸易格局以及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等诸多问题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明晰当代“要素分工”条件下的经济全球化新特征,是进一步理解经济全球化产生其他方面变化的逻辑起点。

(一)要素跨国流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不仅商品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而且以对外直接投资为重要特征的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性不断增强。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生产要素中最为活跃的产业资本,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成为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显示,20世纪70年代初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Global FDI Outward)仅为141亿美元,至80年代初也仅为515亿美元,而到了90年代初,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已经上升至2000亿美元左右,到了90年代末已突破万亿大关,达到1.07万亿美元;进入21世纪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其中于2007年突破两万亿美元大关,高达2.26万亿美元。由于受到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虽然在2008年和2009年有所下降,分别为1.9万亿美元和1.1万亿美元,但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波动中呈现恢复性增长。如2015年恢复至1.76万亿美元之后,2016年和2017年又略有下降至1.75万亿美元和1.411万亿美元。当然,除了对外直接投资以外,诸如技术全

^① 戴翔、张二震、王原雪《特朗普贸易战的基本逻辑、本质及其应对》,载《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蔡昉《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载《人民日报》,2018-09-12。
^② 方勇、戴翔、张二震《要素分工论》,载《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

球扩散以及劳动力跨国流动等呈现稳步扩大和上升态势,均是要素跨国流动性增强的重要表现。

(二) 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竞争的主体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猛增长,带来了生产布局的全球化。在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虽然广义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因为作为要素分工构成要件的跨国公司,对分工和贸易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以要素跨国流动特别是资本跨国流动日益增强的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由于要素流动壁垒不断降低,一国企业无法独享基于本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外国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加以利用,从而整合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本国企业也可以通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在整合和利用全球资源的基础上,创造本国企业竞争优势。可见,国家层面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都可以利用的区位优势,比较优势微观化了。至于究竟谁可以进行这种资源整合,就要看哪个国家拥有更多的国际竞争力强的企业。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资本实力雄厚或者技术、管理等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其利用国际比较优势获利能力就越强。因此,要素分工的实质就是跨国公司依靠竞争优势,借助资本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对全球范围内的优势资源进行整合和利用。

(三) 贸易投资一体化日益显著

国际分工从产品分工发展到要素分工,国际经济活动的基础发生了改变,导致一些新的国际经济现象的出现,其中,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重新组合所进行的全球化生产,进而表现为贸易投资一体化,就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现象。在要素分工条件下,资本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本质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价值链,在产品层面上呈现出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国流动以及最终产品的全球流转,表现为投资创造贸易、贸易带动投资这种融合发展的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有研究认为,当代经济全球化一条基本规律和特征就是投资超越贸易(张幼文,2018)。^① 贸易投资一体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贸易的扩大促进投资的扩大,二是投资的扩大进一步推动贸易的扩大。在要素分工背景下,中间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导致中间品市场交易成本下降,协调中间品生产的成本减少,这会吸引资本持续流入,进一步促

进了生产的全球化。和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所揭示的投资目的不同,这些流入资本的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抢占一国的市场,而是要充分利用东道国“优势要素”,它所生产的产品注定是面向全球市场的,这样,大量投资必然引致大量贸易。

(四) 跨国公司的边界日益模糊

在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下,在不存在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假定下,企业的边界是清晰的,或者说企业有着明确的“国籍”。此时虽然存在着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即外向型企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虽然超越了一国边界,但是就企业自身的边界而言,仍未超越国家边界。换言之,企业具有明确的民族特征和国家属性。然而,当国际分工发展演进到要素分工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生产布局国际化了,因此,企业的边界便越过国家边界从而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特征,或者说企业的“国籍”属性越来越模糊了。一家跨国公司究竟属于哪个国家已经很难分得清楚,因为可能其子公司和分公司遍布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且成为东道国当地“居民”,从而子公司和分公司与总公司分属于不同国家的“居民”,具有不同的国籍属性。即便是通过以所谓“公司总部”为标准进行划分,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跨国公司的总部也可能不止一个并且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总之,虽然品牌是有“国籍”的,但是当跨国公司依托资本等生产要素而游走世界各地时,以国家属性界定其边界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三、红利分配: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对谁更有利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趋势。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比如全球财富的不断增长,贸易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全球绝对贫困人口逐步减少,以及人类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虽然在总体上创造了巨大的红利,但利益分配从来就不是公平和均衡的。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红利分配机制和方式也各有不同。比如,18世纪后半期开始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快速发展阶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分配方式充

^① 张幼文《中国四十年开放型发展道路》,载《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

满了殖民扩张和掠夺。习近平同志(2016)指出,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西方国家靠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世界各地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①。此阶段的经济全球化带给人类的不都是“糖与蜜”,也有“血与火”(钟轩理,2018)^②。因此,处于殖民扩张和掠夺时期的所谓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实质上属于“占地为王”(戴翔和张二震,2018)^③,在这种“分配”机制下主要利益显然被宗主国和西方列强国家所占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体系瓦解,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并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本国经济的道路,此时继续依托掠夺、侵略、战争等传统手段推行经济全球化并获取开放利益,显然是行不通的。为此,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绝对主导优势的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方面不断鼓吹比较优势等自由贸易理论以寻找要求各国“打开国门”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诸如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WTO前身)等国际组织,为其“市场经济”全球扩张构建制度保障。在这一发展阶段,美国等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知识、信息等优势,占据着全球经济竞争中更加有利的地位,并据此到处攻城略地,可以说,“夺市为强”的竞争方式让美国等发达国家收获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红利。

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夺市为强”的竞争方式和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方式,虽然更加有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但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习近平,2017)^④的全球流动。正是因为各种要素的跨境流动日益增强,从而推动了国际分工的迅速演进与演变,促进了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产品为界限的分工向以要素为界限的分工发展。

以贸易利益为主要表现的经济全球化红利主要分为两种,一是静态利益,即分工和交易的静态利益,二是动态利益,即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态利益。如果说在传统国际分工条件下,无论是静态利益和动态利益都更加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话,那么在要素分工条件下,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格局是否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呢?更确切地说,经济全球化红利是否实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沾”的变化,甚至出现了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配格局呢?我们认为,在要素分工体系下,就静态利益的分配而言,仍然有利于美国等发达国

家。这一点在当前的有关附加值贸易核算等大量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实(邢予青等,2011; Pablo et al,2016)^⑤,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占据着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和阶段,从而占据了价值链上增加值创造的大部分。但是在动态利益方面,似乎已经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倾斜。有研究指出“本轮全球化以要素流动为本质特征,国际分工深化和产业梯度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并且认为“全球化的分工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张二震,2018)^⑥。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国际分工转向为要素分工这一根本性变化后,发展中国家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呢?这可以从要素分工条件下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中找到答案。

要素分工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产品价值链的全球分解以及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产品价值链的全球分解,由于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门槛,比如原本在“整机”产品上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或者由于在某个生产环节和阶段由于存在无法克服的技术障碍而无法进行生产的发展中国家,现在由于可以专业化于价值链条上的某一或某些特定环节,从而具有了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比较优势,获得了产业发展的机遇。这是因为,要素跨国流动的本质是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全球整合和优化配置,这种优化配置可能会使得一国原本“闲置”甚至“无用”的生产要素得以被利用,从而转化为现实的比较优势和生产力。通常而言,生产过程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产要素组合过程,显然,当某种生产要素极度富有而另外一种或多种生产要素极度稀缺时,这种富有的生产要素大部分就会处于“闲置”状态,甚至表现为“无用”。此时在

- ①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05-10。
- ② 钟轩理:《不畏浮云遮望眼》,载《人民日报》,2018-10-12。
- ③ 戴翔、张二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的新时代经济全球化》,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 ④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载《人民日报》,2017-01-18。
- ⑤ 邢予青、Neal Detert:《国际分工与美中贸易逆差:以iPhone为例》,载《金融研究》2011年第3期; D. Pablo, Amit K. Khandelwal. *Measuring the Unequal Gains from Trad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131(3): 1113—1180。
- ⑥ 张二震:《条件具备,战略正确,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载《世界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

理论层面上虽然具有国家宏观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但却难以实现微观意义上的实际生产力。“闲置”甚至“无用”的生产要素由于其成本低廉,在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条件下就会成为本国的“优势要素”,“优势要素”恰恰又会对其他国家生产要素尤其是可流动性较强的生产要素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也就是前文指出的比较优势“微观化”,即本国的“优势要素”将会被跨国公司整合和利用,从而成为跨国公司层面的“比较优势”。伴随其他国家相应生产要素的流入,生产过程中要素数量的匹配性问题得以不断解决,“闲置”和“无用”的生产要素在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生产要素的组合中有了“用武之地”,从而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促进了产业发展。这其中,其实不仅本国生产要素作用得以发挥从而促进了产业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国外生产要素流入尤其是先进要素流入,对于本国产业发展乃至转型升级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总之,比较优势的微观化,不仅意味着本土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得以释放,同时还意味着由于利用外来生产要素这种“借鸡生蛋,借船出海”的方式,加快形成并推动生产力高级化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性不断增强,但不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差异仍然存在。比如,作为发展中国家“优势要素”的低技能劳动流动性相对较差,而作为发达国家优势要素的资本、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端要素,流动性相对较强。所谓全球要素分工通常即为流动性较强的生产要素追逐流动性相对较差的生产要素。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人口”优势是存在的,但却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红利,“人口红利”的创造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吸引和集聚国外先进生产要素,在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立和发展的同时,有效推进了产业转型升级。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其实正是对上述作用机制的生动阐释。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在跨国公司边界日益模糊的情形下,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产业获得发展的机遇将会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除了受益于传统的贸易作用机制外,还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的促进机制。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在实现东道国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等方面,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作用机制在传统国际分工形态下效果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在要素分工为主导形式的新型国际分工形态下,上述作用机制的重要性显然不可忽略。更为重要的是,在贸易

投资一体化背景下,贸易和投资对产业发展的拉动和促进作用机制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既然在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贸易创造着投资、投资创造着贸易,即贸易和投资之间具有了强烈的互动作用,那么,二者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机制当然也就具有了互动和强化效果。当然,在这当中,边界日益模糊的跨国公司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跨国公司边界日益模糊,从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能够成为东道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实现跨国公司的利益和东道国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的融合和一致。从这一意义上说,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本土配套企业开展的技术指导、培训等,虽然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也为东道国带来了发展机遇。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通过融入国际要素分工体系,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腾飞。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崛起的奇迹,是中国人民抓住了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别人“帮助”我们建设的。我们也为此付出了诸如进城务工人员背井离乡、儿童留守、环境污染等巨大的代价。中国在以为全球市场提供价廉物美产品的方式实现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与当年列强“血与火的文字载入编年史”的现代化道路有着本质的区别。

四、利益失衡:中美贸易摩擦的理论逻辑

尽管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理由众多,但从根本上看,最终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利益失衡。这正是中美贸易摩擦产生乃至不断加剧升级的内在原因。利益失衡不仅表现为外部利益失衡,即经济全球化红利在国家间分配格局的失衡,同时还表现为内部利益失衡,即经济全球化红利在本国内部分配格局的失衡。就外部失衡而言,同时又包括静态贸易利益的分配失衡和动态贸易利益的失衡。应该说,在上述三种“利益失衡”中,美国国家内部的利益分配失衡,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相比出现的外部动态利益失衡,是导致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关键所在。

静态贸易利益分配失衡尽管被当做重要“口实”,但显然不是特朗普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关键原因。因为即便在特朗普列出的各种理由中,中美贸易逆差被特朗普当做发起对中国贸易摩擦的重要“口实”,在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贸易逆差并非

意味着贸易利益分配的失衡。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巨大贸易逆差,是在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下形成的,不能证明美国成为受损者而中国却成为获益者。如果说确实存在着利益分配格局失衡的话,那么情况其实恰恰相反,即美国实际上是最大的获利者。这是因为在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下,美国不仅占据着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和阶段,从而垄断着价值链上的巨大利益,而且还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获得利益。因此,绝不能简单地将贸易差额作为衡量贸易利益的标准。采用贸易附加值测算方法来衡量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的附加值增值,以及由要素稀缺性原理决定的美国生产要素在他国和地区获得的巨额回报,才是准确度量美国在要素分工条件下真实利益所得的正确做法。在这一方面,目前有关贸易增值核算所取得的丰富研究成果(Koopman et al 2010; 张杰等,2013; 罗长远和张军,2014)^①,以及有关案例研究均证明,从要素收益角度看,美国仍然是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一本在美国率先发布、由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作序的2017年版《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指出,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贸易顺差和逆差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美国的贸易逆差并非意味着利益损失。事实是,顺差在中国,但大部分利益(利润)在美国。虽然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成果,未能唤醒“装睡的特朗普”,但“装睡”并不代表不知道。在深知美国依然是分工和贸易利益中最大获利者的前提下,特朗普仍然一意孤行发起对华贸易摩擦,显然就不是出于静态贸易利益失衡的考虑了。

以价值链分工高低和附加价值来衡量静态的开放利益是合适的,但却无法评估产业发展等动态利益。因此,如果说确实存在着“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失衡的话,那么动态贸易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和变化应该算是其中一种。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变化仍然是一种相对变化而非绝对的实质性逆转。所谓的相对变化,主要是指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等,抓住了以要素分工为主要特征的本来经济全球化战略机遇,从而实现了产业和经济发展,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距离,但是并未在本质上改变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和优势地位的现状。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重心不断向东移动,出现了所谓

“东升西降”的发展变化(金碚,2012)^②,某种程度上显示的正是“差距缩小”的结果和表现;另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DP等仍然遥遥领先,说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逆转。正如前文分析所指出,在要素分工条件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获得了产业发展机遇,从而实现了产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从要素稀缺性原理角度看,从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分工地位角度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确实只能处于中低端,在价值创造的总量中所能获得的附加值确实有限,从而在静态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是由于降低了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门槛,激发了“闲置”甚至“无用”生产要素的现实比较优势,从而获得了土地收入和税收、增加了就业、提高了劳动者收入水平,积累了经济建设和发展所需的基本资金和条件,奠定了产业发展“从无到有”的根本性基础。这些动态发展利益,实际上要比静态贸易利益更为重要。从这一点上看,仅仅用附加价值来衡量中国的开放利益,以价值链的地位来衡量中国的开放水平,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大大低估了对外开放对中国发展进步的作用。在要素分工条件下,虽然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在静态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但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生产力发展的动态利益。美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狭隘的零和博弈思维方式,即认为别人发展起来了就是自己吃亏了,从而试图通过挑起贸易摩擦迫使诸如中国等让步,以满足自己攫取更多经济利益的欲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贸易摩擦,其实有着国内的民意基础。美国民粹主义的抬头,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其中,国内利益分配失衡是导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主因。经济全球化虽然总体上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但并非意味着所有的利益集团

- ① R. W. Koopman, Powers Z. Wang, S.-J. Wei.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chains*. NBER Working Paper 16426, 2010; 张杰、陈志远、刘元春《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载《经济研究》2013年第10期; 罗长远、张军《附加值贸易: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载《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
- ② 金碚《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载《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5期。

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有些利益集团可能会在经济全球化中受损。对此,包括要素禀赋理论中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以及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均给出了经典的阐述。对于诸如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来说,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能够攫取经济全球化发展红利的主要是资本家,是华尔街的金融巨头和科技、管理等精英阶层,普通劳动者和中产阶级可能并未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实惠甚至成为受害者。美国为什么会如此大搞贸易摩擦,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内部的问题。美国总体上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是由于阶层分化,导致国内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且有恶化的趋势。有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社会不平等程度日益严峻。美国最富有阶层的1%的家庭收入和财富,占全国总收入和财富的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9%上升到近年来的20%;美国前10%家庭拥有的财富总量占全国所有家庭财富总量的比重超过75%;后50%家庭拥有的财富量占比不足1%(任理轩,2018)。^① 相比于外部利益的相对失衡,美国国内利益分配失衡才是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所面临的根本性矛盾。面对由于内部利益分配失衡而日益激化的国内矛盾,美国在没有更好对策的背景下,必然试图将国内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为自己社会经济治理能力的滞后和缺失寻找“替罪羊”,这才是当前美国频频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

五、包容开放: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

全球化利益特别是国内利益分配失衡,其根源在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不容否认,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确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伴随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由于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不是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者所共有,而是归资本家所有,这就决定了社会财富分配的非均衡性和非对称性,突出表现为作为雇佣者的企业主购买生产要素所支付的成本,要远远低于作为被雇佣者的劳动者所创造

的真实财富。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以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是工人贫困的积累。可见,美国内部利益分配失衡原本就是由其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决定的。如果说在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下,劳资之间的利益分配失衡还主要表现在“剥削”与“被剥削”之间关系的话,那么在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下,由于资本可以游走世界市场从而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包括劳动在内的其他生产要素,原有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可能进一步蜕变为“遗弃”和“被遗弃”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实现了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这种转移一方面意味着资本通过利用外部更加廉价的生产要素从而获取了更高的收益,另一方面意味着国内相关产业出现空洞化趋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原有“就业”要素包括劳动要素,失去了一部分就业机会,这些失去原有就业岗位而又未能及时通过培训而适应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的劳动力,将因此丧失收入来源,必然表现为原有劳资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这种原本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问题,容易被错误地归咎于以要素分工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这一现象如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误认为机器的发明“夺走”了工人饭碗的情形一样。其实,夺走工人饭碗的并非蒸汽机,蒸汽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而是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工人砸了机器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基于同样的逻辑,导致美国内部利益分配失衡及其加剧的并非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要求,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寻求制度变革提升和完善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内部治理能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如果说,当代经济全球化更加有利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制度优势就是所具备的条件之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我们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促进效率提升的同时,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劳动者

^① 任理轩《逆全球化违背时代潮流》,载《人民日报》,2018-10-17。

的合法权益得到保证。近年来,中国各类生产要素价格集中进入上升期,虽然对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竞争优势带来巨大挑战,但这一变化在另一层面上充分说明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成果惠及了人民大众。习近平同志 2016 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习近平,2016)^①;在 2017 年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始终把人民权利放在首位”(习近平,2017)^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2017)^③。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之所在,也正是有了这一优越的制度,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在确保政治稳定和有效管控风险中,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姚洋教授(2009)研究认为,中国有一个以“无偏的利益、有偏的政府”为特征的“中性政府”。^④所谓“中性政府”主要是指这个政府并不是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置于中心,始终考虑全局发展的需要。毫无疑问,政治和社会稳定是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前提,而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利于我们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也只有具备了这一条件,我们才能够快速而全面地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抓住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虽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仍然处于中低端的不利地位,但却能更好地应对经济全球化,并成为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忠实倡导者和拥护者的根本原因之一。

针对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有些国家则不能,为什么有些国家的贫富差距较小而有些国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等问题,美国学者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12)在其共同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从制度因素角度给出了具有说服力的答案,即一个国家采取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决定了其经济绩效以及与他国的差异,并且认为缺乏包容性的制度往往是导致各种问题的

主要原因。^⑤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市场经济插上工业革命的翅膀后,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和拓展(金碚,2013)^⑥,因此,当经济全球化演进到以要素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新阶段后,市场经济体系内在缺陷所引发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就会更加突出、更加迅速、更加严峻,此时,需要有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制度进行应对。而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恰恰缺乏这种包容性,强资本弱劳工、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社会严重不平等是美国社会的固有特征,也是其主要的痼疾表现。由于其未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理念,因此无法有效解决机会不公平、分配不公平等问题。当这些矛盾和问题在以要素分工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被不断放大时,美国将其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以转移国内矛盾似乎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但本质上彰显的其实是应对新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制度劣势。

目前,美国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本质上是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单边主义行为,是对全球经贸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的破坏和践踏,对经济全球化的顺利推进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应当看到,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贸易问题,而是涉及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和重组、涉及全球生产格局的变化和调整、涉及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因此,应对贸易摩擦的思路和政策举措同样应该突破原有的思维观念和政策工具,要以先进的理念引导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不仅要让经济全球化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内增加全球财富总量,还要让经济全球化的成果能够更好地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全球化应向何处去?我们认为,引领新时代经

- ①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05-10。
- ②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7-01-20。
-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载《人民日报》,2017-10-28。
- ④ 姚洋:《中性政府:对转型期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解释》,载《经济评论》2009年第3期。
- ⑤ 参见[美]德隆·阿西莫格鲁、[美]詹姆斯·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
- ⑥ 金碚:《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载《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期。

济全球化,要秉持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才能有效地应对新时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引发的各种利益分配失衡问题,才能更加有助于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和包容的世界;也只有引导经济全球化走上“包容开放”的发展道路,才能使得经济全球化真正实现普惠、平衡、共赢,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分配失衡问题。开放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应该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世界范围内看,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应该倡导包容性增长,也就是说各国都应该从经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能够实现“利益均沾”;二是从单个国家内看,处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民之间要相互包容,地区之间要实现协调发展,从而使得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够从全球经济增长中获益。也只有上述两个层面同时实现包容性增长,经济全球化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包容,即全球经济增长是为了惠及全球人民,让全球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

当今世界虽然在物质和科技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包容性远远不够,突出表现为部分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的机会和条件还很不充分。在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中,像中国这样具备基本发展条件从而能够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机遇的国家,为数并不多。例如,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最贫穷的一些非洲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足美国的百分之一,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6“危险线”。这些数据均表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包容性尤其是对发展中

国家的包容性仍然不够。即便是具备发展条件从而抓住发展机遇的国家如中国,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如美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但是人均GDP等指标仍然远远滞后于发达国家,动态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仅仅是一种相对变化。如果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包容性不足,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面临增长空间和潜力的严重制约。因此,从世界范围看应该倡导包容性增长,使不同层次的国家都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这是新时代经济全球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各国还应该加强国内改革和完善制度建设,提升治理能力,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均衡发展,让更多的民众能够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分享经济全球化红利。要充分重视收入分配调整、职业培训、就业创业等方面的国内改革和国际合作。总之,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有更加包容的制度与之相适应,其中不仅包括要进一步完善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构建起更加均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和国际规则,而且还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各国的内部改革,建设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制度,为实现普惠性发展提供保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作者简介:张二震,江苏丹阳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戴翔,安徽合肥人,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于尚艳;责任校对:于尚艳】

is to focus on the reality basis and restricted conditions that generate power with morality. We refer to it as the legitimacy of educative power. Reviewing studies on the origins of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the domestic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ere lies a severe imbalance in methodology while discussing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educative power, which turns out that people are used to use justification rather than legitimacy to find answers.

Key words: educative power; legitimacy; justification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Sino-US Trade Friction

(by ZHANG Er-zhen, DAI Xiang)

Abstract: Unlike trade protectionism that usually occurs during the economic depressi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voked trade friction wi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under the overall goo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reason lies in the imbala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of globalization. Under the curren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factor division of labor, on the one han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tatic interests,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occupies the high end of the value chain by virtue of technology and other advantages and obtains most of the benefits represented by value added, there are new changes in promoting dynamic interests such as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are more advantageou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se changes have impacted on the lack of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other han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factor division of labor,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have taken on new form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ighligh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labor and capital of "exploitation" and "being exploited". The imbalance of interest distribution has further evolved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andonment" and "being abandoned". With the prominent defects of domestic system and the lagging governance ability, Trump government has chosen to shift the contradiction intensified by the imbalance of internal interest distribution onto external factors and adopt the anti-globalization trade protectionist policy. To get out of the predicament of "anti-globalization", we should not only build a more inclusiv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rules, but also accelerate domestic reforms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Key words: Sino-US trade friction; factor division of labor;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nclusive openness

China's Peaceful Rise and Sino-US Trade War

(by CHEN Ji-yong, YANG Xu-dan)

Abstract: During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since 1978, China has been continuously integrating in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chieving the rise of i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atus and realizing its peaceful rise. After Trump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e took the strategy of "global contraction" and "America first", viewing China as the global strategic competitor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he has provoked a trade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on the grounds of unfair trade, which adds a lot of uncertainty to China's future path of peaceful rise. How to deal with the US-China trade war?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difficult problem that China must solve.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ical vicissitudes of the world's great powers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 we can see that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has not been all plain sailing, and it is the result of combining timeliness, topographical advantages and the support of the people.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US-China trade war, China must bear in mind the historical lesson of the US-Soviet struggle for hegemony and the disastrous defeat of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Cold War,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market-oriented reforms,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system. Meanwhile, China needs to continuously expand its opening-up oriented to globalization, fully integrate itself into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achieve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win-win results. History tells us that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as rules to follow, but each country is unique. Therefore, only by proceeding from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can China find its path to success in the peaceful rise of great powers.

Key words: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the US-Soviet struggle for hegemony; lessons learned; US-China trade war; path selection

Institutional Friction, Coordin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Sino-US Trade Friction and Japan-US Trade Friction

(by DONG Y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no-US trade friction and the historical Japan-US trade friction,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stitutional friction and coordination involved in the two bilateral friction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promot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untries evolving from the exchange of commodity elements to production integration, and in the closer interaction,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wo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systems gradually appear. As a result, bilateral trade frictions gradually develop from microeconomic friction to comprehensive friction and institutional friction. Comprehensive structure negotiation and consultation form the framework of bilateral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and China's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can help build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market competition and further release its economic vitality.

Key words: Sino-US trade friction; Japan-US trade friction; institutional friction;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An Examination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

(by ZHANG Ming-zhi, YUE Shuai)

Abstract: Unlike previous trade frictions, the tariffs im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n Chinese exports in this round of trade friction are more concentrated on products with high technical content, which shows that this round of trad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essentially the US's strategic containment of China. The Sino-US trade friction will destroy and restructure the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and trade system by affecting multilateral, regional and bilateral trade systems, producer behavior, consumer markets and other factors,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achieve "manufacturing reflux" from i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adual loss of Chines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heap labor, the US has provoked the trade friction with technology interruption, which will further inhibit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its rising position, affecting China's benefit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Facing this reality, China can start with taking into account both GVC and NVC, strengthen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ore technologie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lateral, regional and bilateral trade systems, and realiz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xport markets, raw materials and key components, so as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s, strive to break through the low-end lock-in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achieve a steady rise of it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Key words: Sino-US trade friction; global value chain; effect research

Theoretical Basi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Right of Necessity

(by TIAN Hong-jie, XIAO Peng)

Abstract: As the essential proper foundation of the act of rescue, the principle of social solidarity has two different ways to be interpreted-liberalism and republicanism. According to China's constitution and current situation, republicanism should be chosen a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basis of the system of the right of necessity. The rule of self-defense is a kind of advisory norm which bears the institutional value to propagate common good and virtue. Therefore, it should be morally chaste to some extent. The principle of protecting freedom and promoting common good are the basis for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 the right of necessity. The system of the right of necessity includes 6 kinds of rights: self-defense, seizing active criminal, defensive necessity, aggressive necessity, seizing non-active criminal, and self-help behavior.

Key words: liberalism; republicanism; self-defense; act of rescue; right of necessity